



教 学 快 讯

第 55 期（总第 213 期）

浙江工业大学教务处编

二〇一四年二月

目 录

新闻快讯

- ◆ “拔尖计划”锻造基础学科领军人才
- ◆ 校领导带头，资深教授参与，导师一对一指导——对外经贸大学青年教师加速成长
- ◆ 上海科技大学将为每名本科生配导师
- ◆ 首部国家级《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3月1日起实施
- ◆ 转变教育管理方式推进管办评分离
- ◆ 辽宁：六个新设本科专业因评估不合格暂缓招生

教改动态

- ◆ “超级大课堂”火了 高校思政课“活”了
- ◆ 湖南商学院：实施“大商科”模式培养创业人才
- ◆ 高等教育改革：江苏如何破题
- ◆ 东华大学：学生依托网络“易课堂”让学习更轻松

教育评论

- ◆ 高校国际化的“而立之思”
- ◆ 教学评估：是“指挥棒”，还是“测量仪”？
- ◆ 协同创新在芬兰
- ◆ 检验本科学业，毕业论文还能否作为最重指标
- ◆ 杜玉波：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的基本思路和重点任务

“拔尖计划”锻造基础学科领军人才

首批 500 名毕业生 95% 进入国内外高水平大学深造

截至目前，参与“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 19 所参与高校中，已入选“拔尖计划”的学生共 4500 人，首批 500 名毕业生中有 95% 进入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继续深造。

2009 年，“拔尖计划”在教育部、中组部、财政部的推动下，先行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学科领域，选择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19 所高校实施。其目的是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基础学科建设一批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建立拔尖人才重点培养体制机制，吸引优秀学生投身基础科学研究，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良好氛围，努力使受计划支持的学生成为相关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才，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队伍。

“计划启动较早高校的学生已崭露头角。”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介绍说，北京大学学生曹霆 2012 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自然·通讯》发表文章。复旦大学学生达佩孜以第一作者在《纳米快报》上发表研究成果。

近年来，参与“拔尖计划”的 19 所高校立足各校实际，积极借鉴世界一流大学拔尖创新人才理念、模式和方法，创新机制体制，深入推进改革。建立高校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区，有的组建专门的学院，如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堂”、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的“致远学院”、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学院”；有的设立专门的试验班，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华罗庚数学班”、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了“理科试验班”等；有的则以普通班为依托，对拔尖学生辅以专门指导。

据了解，参与“拔尖计划”的高校聘请国际知名教授组成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学生培养方案，全面负责学生的培养和项目管理。如清华大学聘请丘成桐、朱邦芬、张希、施一公、姚期智等人担任“拔尖计划”各班的首席教授。同时，各高校配备最优秀的国内外师资、大批著名教授深入参与计划实施，其中两院院士、“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长江学者”及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高水平专家学者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亲自为学生授课、担任导师、组织学生研讨交流。如北京大学请陈佳洱、田刚等院士为“拔尖计划”学生指导。

在学生选拔方式上，参与高校实行多元化模式。“选才”与“鉴才”相结合。“在选拔标准上，综合考虑学生的兴趣志向、学科潜力、综合能力、心理素质等因素，科学地看待‘偏才’、‘怪才’。”张大良介绍说，在选拔过程中实行多阶段动态进出，对进入计划的学生进行综合考查、慎重分流，遵循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规律，减少功利、重在长远。

“拔尖计划”实行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各参与高校普遍实行“导师制”、小班教学与研讨、个性化学习计划。导师们指导学生进行学业规划、课外阅读、科学研究等，并鼓励学

生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让学生有自由探索的时间和空间，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力。这些高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实验室、教学实验中心等向学生开放，提供较大的空间用于师生交流、学生讨论，并邀请世界级学术大师开展学术报告、学生座谈等，营造浓厚的学术创新氛围。

此外，“拔尖计划”各高校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一流学术人才，多数高校积极采用双语或全英文教学模式。据初步统计，2013年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近150所国际知名高校，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学校的350余名知名学者教授，以授课、讲座、研讨等多种形式参与到“拔尖计划”学生培养过程中。“拔尖计划”的本科生素质和本科教育水平也得到这些学者的认可。

“‘拔尖计划’不仅吸引了一批有热情、有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以崇尚科学、追求学术为人生理想，更激发了高校教师培养创新人才的热情，也在全国高校产生了广泛影响，带动了高校各学科专业全方位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发挥了较好的示范辐射作用。”张大良说。

中国教育报 2004-2-25

校领导带头，资深教授参与，导师一对一指导

对外经贸大学青年教师加速度成长

日前，《2013年中国高校通用就业力白皮书》发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通用就业力总排名位居全国第五，居全国财经类高校榜首。

学校党委书记王玲说，好的就业有赖于高校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对外经贸大学始终把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人才作为办学的首要目标，着眼于把每一位学生都打造成符合市场需求的“精品”。学校着力打造一流的师资队伍，每一位新入校的青年教师，学校都会为其找一位负责的指导教师，保证讲台质量不滑坡。从2009年起至今已有150对新老教师结成对子。

带教法 育英才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青年教师王明喜的“导师”是刘树林。初上讲台，师傅对他的第一项要求是“站稳讲台”。

王明喜是刘树林教授指导过的博士生之一。刘树林主讲的“数理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都深深地印在王明喜的脑海里。而王明喜任教第一门课程就是“数理经济学”，他信心满满，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但导师刘树林却很紧张，把自己多年积累和更新的教辅材料，幻灯片、教学大纲、给学生选择的作业题全部交给了王明喜。

“刘老师说，自己讲授‘数理经济学’已经十几遍，但每次重新讲授这门课时，仍然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特别向我强调，教学不能有一丝马虎。”王明喜说，“接过教辅材料，望着一脸严肃的导师，我感到了三尺讲台的庄严。”

从此，师徒二人同教一门课，王明喜经常向刘树林请教，有时甚至会因各持己见而争论，观点在碰撞中擦出许多火花，两人的关系亦师亦友，更融洽了。

“让我们担任青年教师的指导教师，是学校对我们的信任，是荣誉，更是责任；指导青年教师对我们来说，是义务，也是使命。”刘树林说。

带科研 出成果

2010年，国际商学院的青年教师李瑜成功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她把取得这一成绩的最大“功劳”归于导师林汉川。她说：“林教授以他事无巨细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事必躬亲的热心品质给了我太多的感动和激励。”

李瑜申报基金的申报书第一稿只有20页，就在她把初稿发给林汉川的第二天，导师就给她打来电话。从申报书的题目，文献综述的写法，到具体词句的选择，以及申报书的格式，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李瑜的笔记做了四五页。按照林汉川的意见，李瑜逐条地对申报书进行了修改，修改完的版本扩充到了60多页。“从你这份申报书中能看到打动评委的学术良心。”这是林汉川对李瑜的鼓励，也深深触动了她。

此后，林汉川邀请李瑜参加他主持的项目。这段经历让李瑜对学术科研的氛围有了更切身的体会。李瑜说：“回首4年，我从林汉川老师身上受益良多。老师的指导和帮助，让我顺利度过了学术生涯的开始阶段，为今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基础。”

树师德 出人才

青年教师拜师活动，目前已成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品牌活动，并在2013年被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评为北京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优秀项目。

老教师以其高尚品行影响着青年教师，青年教师进而去影响更多的学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形成了浓郁的学风，校风优良，社会声誉不断提高。一大批道德高尚、品行端正的青年教师也在这项活动中获得成长，多人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辅导员”等荣誉称号。2009年参加拜师活动的两位青年教师杨震宁和王吉美还主动要求赴新疆支边，表现出奉献精神。

张新民副校长等20余位校院领导带头，有十余位资深教授更是连续几年参加活动，勇带新人。据不完全统计，在2009年拜师结对的24位青年教师中，有8人在本科教学评比中获得前10%；在2010年拜师结对的35位青年教师中，有10人获得教学前10%；在2011年拜师结对的46名青年教师中，有5人获得教学前1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建香深有感触地说：“拜师结对活动为青年教师快速成才搭建了平台。青年教师加速成长，终身受益，指导教师在教学科研上承担重任的同时，勇带新人，这是学校事业常青的不竭动力。”

上海科技大学将为每名本科生配导师

不设笔试，根据“校园开放日”表现和老师推荐就能获得加分，每名本科生都有导师……由上海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建设的上海科技大学，19日宣布启动面向全国的本科学招生。虽然计划招生人数不过200人，但强大师资、产学研相融的环境和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为本的办学理念，使得这所小规模大学的亮相格外引人注目。

2014年是上海科技大学首次招收本科生，招生方式为：学生提交自荐信和老师推荐信、个人成绩单等材料申请，学校通过以综合面试为主的“校园开放日”活动来考查学生综合素质，无须笔试，形成以等第制为基础的评估结果，即可获得高考后加分投档资格。

据介绍，上海科技大学在办学体制、内部决策机制、学术民主机制、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均大胆创新。学校精简行政管理架构，教师聘任全面实行“非升即走”制度，保证教师队伍的持续高水平。人才培养采用“学院”加“书院”的分工协作模式。校长江绵恒表示，上科大“不想建国际一流大学”，将紧紧围绕着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办学，以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为使命，打造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

学校将按照1:10至1:12的师生比配备师资，比例高于目前国内众多顶尖名校。到2015年底，在校学生规模将稳定在本科生2000名、研究生4000名(含硕博连读生3000名)。而专任教师规模将达1000人左右。目前受聘的专任老师中，已有3位诺贝尔奖得主、1位美国三院院士、26位两院院士、70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30位各级“千人计划”人才和3位外专“千人计划”人才。学校要求每位教师必须承担本科教学任务，每位本科生都将配备一位导师。学校按理科实验班、生物科学类、电子信息科学类3个专业大类招收本科生，不另设系，学生入学后有机会重新选择专业。

人民日报 2014-2-21

首部国家级《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3月1日起实施

首次明确学术委员会为高校最高学术机构

- 以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评审等职权
- 界定了学术委员会中学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比例，向教师和基层学术组织倾斜
- 对学术不端行为，学术委员会可以依职权直接进行处理或者建议相关部门处理

记者19日从教育部获悉：《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将于3月1日起实施。《规程》对高校学术委员会的组成、职责及运行等重要问题分别作了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国家规范，首次明确了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学术组织体系中的最高学术机构定位。

以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促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对分离与配合

“《规程》出台将切实提高学术组织在高校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对分离、相互配合，为在高校内部实现教授治学，形成鼓励教师专注学术、发展学术，构建以学术为中心的评价机制，提供制度保障。”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法制办公室主任孙霄兵介绍。

《规程》大大强化了学术委员会在学校组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依法设立学术委员会，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并以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

“大学是学术机构，就该坚持学术立校、教授治学的办学理念，把学校的学术思想、专业建设、教学计划、科研方案、学术评价交给学院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来决策。”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给出评价。

黄进表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建立科学合理完善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高校学术委员会是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主体，高校学术治理体系是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不可或缺的内容。《规程》规定了高校学术委员会的定位、职责，以及与其他学术组织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高校党政领导不超过委员总人数的1/4，注重发扬基层学术民主

《规程》明确了学术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和产生规则，界定了学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的比例，强调向教师和基层学术组织倾斜。“学术委员会一般应当由学校不同学科、专业的教授及具有正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组成，并应当有一定比例的青年教师。学术委员会人数应当与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相匹配，并为不低于15人的单数。其中，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委员，不超过委员总人数的1/4；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院系主要负责人的专任教授，不少于委员总人数的1/2。”

同时，《规程》在委员产生机制上，要求注重发扬基层学术民主，并对委员的代表性和流动性提出要求。为平衡学术委员会与学校行政的关系，《规程》还对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产生办法作了规范，规定主任委员由校长提名，全体委员选举产生，或者由全体委员直接选举等方式产生，具体办法由学校决定。

为了强化学术委员会的作用与职权，《规程》还明确了学术委员会具有审议（决策）、评定、咨询及学术纠纷裁定处理等4类职权，对每一类职权又有具体规定，为学术委员会切实发挥作用提供了依据。《规程》还对学术委员会自身建设的组织与运行规则、议事程序与监督机制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规范了会议规则，建立了会议开放、委员回避、决定公示及异议、年度报告等多项制度，保障学术委员会按照学术规则组织、运行和接受监督。

针对学术不端，《规程》专门强调，“对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学术委员会可以依职权直接撤销或者建议相关部门撤销当事人相应的学术称号、学术待遇，并可以同时向学校、相关部门提出处理建议。”

“一直以来，高校学术委员会都存在几大亟待解决的问题”，北京大学秘书长、教授杨开忠介绍，“职权不够清晰，权责边界模糊，职权弱化，在学校治理结构中的定位和作用亟待明确和加强；委员行政化，代表性、开放性、民主性不足，组成主体和程序规则亟待完善；会议制度与规则不健全，运行机制亟待完善；学术组织在高校碎片化，高度分散，依附于职权部门，亟待加强学术组织的独立性；学术委员会缺乏人财物的必要支撑和保障条件。”

杨开忠强调，“《规程》对以上这些当前高校学术委员会存在的几大问题，做出了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同时，又充分尊重了高校的差异性和独立性，为高校个性化制度安排留出了充分的空间，填补了空白。”

真正落实，还需避免来自行政管理部门等多方面的干扰

“《规程》的出台，目前还只是体现在纸面上，真正变为大学管理的行为规范，还有一系列工作。落实自主的管理学术的权利，还需要避免来自多个方面的干扰。”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劳凯声强调。

“首先，需要避免来自外部的干扰因素，如社会比较关注的行政化的问题，如何处理大学和政府之间关系问题，如何处理管办评分离的问题；其次，要避免来自内部的干扰因素。长期以来，高校已经形成了相对的管理集权，在高校的运行过程中，学术与管理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如何避免来自内部的管理方面的干扰，是落实好《规程》的重要方面。”劳凯声强调。

“目前，一些高校的学术共同体出现了问题，进入了不符合标准的人，因此出现了学术失范与学术造假的问题。”劳凯声指出，“因此，我们高兴地看到，《规程》奠定了高校学术委员会独立行使学术的权力，奠定了在学校学术组织体系中的最高学术机构的地位；也从组成、运行制度等方面，对于高校内部学术和管理的关系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对于高校学术不端和学风的问题，也做出了相应规定。”

人民日报 2014-2-20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出台《深化教育督导改革转变教育管理方式的意见》

转变教育管理方式推进管办评分离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印发《深化教育督导改革转变教育管理方式的意见》。《意见》的出台，旨在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教育督导条例》要求，强化国家教育督导，改进教育管理方式，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推动教育科学发展保驾护航。

《意见》共分为四部分、十六条，指出了深化教育督导改革在转变教育管理方式中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深化教育督导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明确了深化教育督导改革的主要任务，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教育督导机构建设、督学队伍建设和经费保障。

《意见》明确深化教育督导改革的总体思路是：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教育督导条例》，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持的原则和强化国家教育督导、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的要求，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际经验，建立督促地方政府依法履行教育职责的督政机制、指导各级各类学校规范办学提高教育质量的督学体制、科学评价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估监测体系，形成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体系，为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据教育部督导办负责人介绍，《意见》根据教育督导督政、督学、评估监测的三大职能，明确了深化教育督导改革的工作目标：督政方面，建立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机制，严格落实问责制度，引导地方政府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能力和水平。督学方面，完善督学队伍管理，实行督学责任制，监督指导各级各类学校规范办学行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教育质量评估监测方面，建立教育督导部门归口管理、专业机构提供服务、社会组织多方参与的专业化教育质量评估监测体系，对各级各类教育进行科学、系统、权威的评估监测，为改进教育教学、管理、决策提供依据和支撑。

据教育部督导办负责人介绍，《意见》从督政、督学、教育质量评估监测、教育督导和评估监测结果使用四方面提出了深化教育督导改革的主要任务，这也是近期教育督导工作的重点。

督政方面：一是建立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制度，开展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的综合督导；二是建立专项督导制度，就一些普遍性问题和教育重点工作开展专项督导；三是做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工作；四是建立对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督导制度。

督学方面：一是加强督学责任区建设；二是加强学校视导队伍建设；三是开展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办学条件、规范办学行为和实施素质教育的督导评估；四是针对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项督导。

教育质量评估监测方面：一是建立健全各级各类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体系，完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标准和工具，建立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制度和地方政府发展教育事业情况监测制度；二是根据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实际需要，开展教育质量监测工作；三是培育和扶持一批专业评估机构，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教育质量评估监测；四是加强教育质量监测国际交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教育质量监测项目。

教育督导和评估监测结果使用方面：一是完善教育督导和评估监测报告发布制度，建立分级发布教育督导和评估监测报告制度；二是建立健全教育督导和评估监测的公示、公告、约谈、奖惩、限期整改和复查制度；三是建立教育督导和评估监测问责机制。

此外，根据《意见》，国家将成立教育质量评估监测机构，统筹开展全国教育质量评估监测工作。《意见》要求各地教育部门整合教育协会、学会、教研室以及其他具有教育评估监测职能的机构和资源，实现教育督导部门的归口管理，为系统开展各级各类教育质量评估监测奠定组织基础。各地要加强督学队伍建设。完善督学管理制度。结合实际配齐专职督学，聘任一定比例的兼职督学，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督学队伍。探索建立督学持证督导和督学资格制度。

《意见》既是落实《教育督导条例》，对深化教育督导改革，全面加强教育督导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也充分体现了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强化国家教育督导”、“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最新要求。《意见》的出台，将对深化教育督导改革、转变教育管理方式、指导教育督导工作开展、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重要的影响。

中国教育报 2014-2-20

辽宁：六个新设本科专业因评估不合格暂缓招生

日前，辽宁省教育厅在其门户网站上公布了2013年度全省普通高等学校首届学生进入毕业学年的新设本科专业评估结论。其中有6个专业评估结论为不合格，这6个专业将被暂缓安排招生计划，并在一年后对其进行复评。

为切实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辽宁省教育厅组织专家于2013年11月12日开始对省内34所高校的70个本科专业进行评估，此次评估采取网络评审和专家不进校的方式进行，主要依托“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数据库和信息平台”开展，评估内容包括高校人才培养定位和培养模式、专业教学团队、教学基本建设、教学质量保障四个方面。

评估结果显示，在参与评估的70个专业中，有28个专业达到合格标准，转为正式专业；36个专业为基本合格，辽宁省教育厅将限制这些专业的招生规模，并在一年后进行复评；6个专业评估结论为不合格，省教育厅将暂缓安排这些专业的招生计划，并在一年后对其进行复评。

评估结论为不合格的6个专业包括沈阳理工大学的汉语言文学、渤海大学的德语、沈阳大学的哲学、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的电子商务、大连科技学院的劳动与社会保障、辽宁何氏医学院的市场营销。

本次评估结论为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专业，除一些专业是因为人才培养方案不尽合理、质量评价与反馈机制不够健全等，多数专业是由于“教师队伍结构与数量”和“实践教学条件”两个重要指标“遭遇”基本合格甚至不合格的。

据辽宁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评估结论为不合格的专业，并不意味着学校在该专业上不能保证基本的教师开课与实践条件的配备，而是更多反映出该专业建设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也反映出省教育厅促进高校切实加强内涵建设，优化专业结构，高标准严要求举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决心。

据悉，辽宁省教育厅还建立了约谈制度，对评估结论为“不合格”和“基本合格”专业所在学校相关负责人进行专项约谈，反馈专家评审意见，共同研究制定整改方案，以切实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重在建设”的评估目的。

中国教育报 2014-1-3

上海创新思政课教学,网络海选问题,师生现场交锋

“超级大课堂”火了 高校思政课“活”了

“为什么大学生要有理想信念,做一个平凡人就是胸无大志吗?”这个从1300多条提问中精选出来的话题,成为不久前上海首次“超级大课堂”的对话焦点。200名大学生与20多名教师在上海大学现场“PK”,思想激烈碰撞,场面火爆堪比电视选秀节目。

从11月起,上海推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超级大课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实验课,创新上课形式,先征集问题后现场互动,集聚各高校优势资源,正面回答大学生成长中实际遇到的困惑与难题。集体研讨、跨学科支撑等新手段的运用,使“超级大课堂”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载体,引爆了全市高校学生学习思政课的热情,让科学理论入耳、入脑、入心。

在问题征集阶段,广泛征求正在开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活动的任课教师与大学生,不仅随堂收集纸条,还借助易班网络平台,针对绪论和第一章内容征集到1300多个问题。剔除重复问题后,有967个不同的教学问题。上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协作组加以研究讨论,确定首期“超级大课堂”围绕理想信念与胸无大志的关系展开探讨。

“超级大课堂”之“超”、“大”,不仅体现在问题来源广泛,也体现在师资阵容“豪华”。现场互动在4支高校团队与数百名大学生之间进行,首期参与对话的4所大学为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每支高校团队都有6名成员,包括思政课教学科研组织机构负责人、辅导员、大学生、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域教师、思政课教师等。4支高校团队轮流上场,先用事先准备的5分钟视频回答该期话题,体现集体备课的成果,之后用15分钟现场解答学生提问。

“作为一名在西部支教的师范生,我是平凡人吗?什么样的老师是不平凡的?”“德国不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求中国的大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呢?”……一个个尖锐辛辣的问题抛出来,高校团队现场回答,没有PPT,没有查阅资料的时间。4支高校团队依次上场,共解答了大学生关心的20多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刘西拉作为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域教师参加,他回顾了自己与钱学森的交往经历,讲述理想信念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引起现场大学生的强烈共鸣。在“超级团队”评比中,上海交通大学高票当选。最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潜涛做总结点评。

整期“超级大课堂”历时100分钟,调动起了师生参与热情。同济大学学生刘江亭说:“参加‘超级大课堂’,我受到了不一样的心灵洗礼。在以往传统的思政课教学中,我们被动接受,以致于忘记了该如何思考。这次活动以学生提问、教师解答的方式,拉近了师生距

离，教师告别了课件，学生听到的也不是说教，易于对思政课产生浓厚兴趣。”

据介绍，“超级大课堂”将结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内容开展多期，第二期主题从 5687 个问题中海选出来，确定为“如何理解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两者到底啥关系”。待数期内容结束后，将形成“一库一盘一集”的成果，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问题资料库、“超级大课堂”实录光盘和教学案例问题解析集，辐射全市高校思政课教师。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副主任高德毅说：“‘超级大课堂’聚焦学生所关注的现实问题，突破‘你教我学’的传统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对问题用主人翁的态度思考，对教师也是一种激励和锻炼。这种教学实验实现了思政课教学方式的创新，有利于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中国教育报 2013-12-20

湖南商学院：实施“大商科”模式培养创业人才

臭豆腐是湖南长沙的特色小吃，长沙的臭豆腐哪里最好吃？很多人都会说起黄兴路步行街的“黑色经典”品牌连锁店。

春节期间，这家店一共卖出臭豆腐 20 余万片，营业期间平均每半分钟卖出 30 片。然而，很多人想不到的是，这个传统小吃品牌的创始者，是湖南商学院毕业才 3 年多的学生。更让人惊讶的是，当年学校提供的 2000 元的创业基金，如今已支撑起近 2000 个家庭的创业梦想。

康清平是湖南商学院财务管理专业 2006 级学生。2010 年他参加学校大学生创业比赛，组委会发现了这个好苗子，专程请来湖南友阿集团董事长胡子敬、三一重工总裁助理袁春燕做他的项目导师。

“他们建议我改变思路，成立一个连锁投资平台，为更多想创业的人创造机会。”获得比赛二等奖的康清平，拿着学校提供的 2000 元创业基金，牵头成立了一家公司。才一年多时间，他和团队就打造了“黑色经典”等多个知名小吃品牌，还办起了长沙第一个获得生产许可证的臭豆腐加工厂，在长沙、广州、海南等全国各地吸收近 2000 个加盟商。

湖南商学院院长唐未兵介绍说，学院牢牢把握“大商科”这个核心，通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泛商科、模块化、自选式”学分制课程体系，打通专业、系部、学年之间的界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据不完全统计，该校毕业生有过创业经历的达到 40% 以上，在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领域创办民营企业逾 3000 家，仅回湘创业的企业家校友就已累计为家乡建设投资 4 亿元以上。

湖南商学院作为一所地方商科院校，一直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这种服务既有‘大餐’类型，如培训讲课等，也有‘小灶’模式，如教师的上门蹲点服务。成

功的教学改革，应该是既培养出大批优秀学生，又涌现出大批能为企业解决问题的名师。”唐未兵告诉记者。

据该校最新统计，全校60%以上的专业教师有企业实践经历，30%左右的教师担任企业的专业顾问和独立董事。近年来，学校与企事业单位开展合作项目近200项，先后为湖南亚华种业、酒鬼酒公司、真维斯公司、岳阳巴陵石化等40多家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人员培训、专业咨询等多项服务。

中国教育报 2014-2-24

高等教育改革：江苏如何破题

——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

高等教育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进行的战略部署，每一点都剑指教育改革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一场实质性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已然箭在弦上。

江苏省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示范区，将从何处破题？怎样破题？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

记者：江苏省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打造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江苏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江苏省下一步将如何通过改革推进高等教育大省向强省的转变？

沈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进行了战略部署，为推进高等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指明了方向。目前，江苏省有普通高校130所、独立学院26所，在校生超过180万人，普通高校数和在校生数位居全国第一，全省高校建有部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31个，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51个、教学团队86个、教学名师38位，质量建设各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

江苏将继续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和有利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社会氛围，争取到2020年实现教育发展主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学习型社会和人力资源强省。

记者：“钱学森之问”考问着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江苏省教育部门对于实现高校去行政化，创造一个自由、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有什么样的设想？

沈健：实际上，“钱学森之问”不仅仅是在问大学，也是在考问整个社会，但是教育工作者要有振聋发聩的声音，更要有当仁不让的气魄和脚踏实地的精神。破题“钱学森之问”，江苏省提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一个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环境。

首要转变的是教育行政部门职能，将属于高校法定办学自主权的事项和管理职能，交给高校或社会中介组织去管。其次要完善公办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党委领

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同时淡化高校学术活动的行政化倾向，形成尊重学术权力的政策导向和考评机制。此外，还要加强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章程建设，下移学术权力和学术管理的重心至院系、学科，通过院系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学科咨询会等方式确立、维护基层的学术权力。

以南京师范大学为例，近两年，该校加快“教授治学”步伐，全校 25 个二级学院全部组建了教授委员会。委员会由 10~15 名教授组成，直接参与学院管理、教师聘任、人才培养计划等工作，委员会的决策直接左右学校的决定。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2014 年高校自主招生已经拉开帷幕，江苏省在推进高校考试招生的改革方面有哪些突破和新的探索？

沈健：江苏省在听取意见基础上，健全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体系。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继续推进自主招生改革试点，采取更加自主、灵活的多元化录取方式，实行高考、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与高校测试相结合的综合加权评价模式。加快推进高职（专科）院校注册入学改革试点工作，逐步形成在高职（专科）院校全面实行学生以高中教育阶段在校学习成绩、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结论等直接申请注册入学的招生录取模式。

光明日报 2014-2-18

“易课堂”让学习更轻松

——东华大学依托网络社区服务学生学习纪实

寒假前东华大学的期末考试中，“几何与多元微积分”、“大学物理”等一批学生普遍认为学习难度较大的课程，学生不及格率大幅下降。东华大学教务处处长吴良说，这主要得益于“易课堂”。

“易课堂”是东华大学依托易班网络社区打造的以学习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的网络学习空间。那么，“易课堂”是靠什么吸引学生的呢？记者日前走进东华大学进行了采访。

为学生量身定制“校服”

找教师拷课件、泡图书馆查资料、借阅“学霸”的笔记，对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的大二学生陈星宇来说，学习原本是一件费心费时的事。而如今，“易课堂”让学习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陈星宇说，“易课堂”就像是为学生量身定制的“校服”，穿着既方便又实用。

记者登录东华大学在易班网建立的“易课堂”发现，以“高等数学”、“C 语言”等课程为单位，形成了一个网络“圈子”，即课程班级。在每个课程班级里都能够找到相关的课堂笔记、习题、往年试卷、教材、教师课件以及科研参考材料。除此之外，学生还能够与同上一门课的其他同学一起在网上讨论难题、探讨学习窍门，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还能够在线向任课教师求答案。

短短6个多月,已有100余门课程通过“易课堂”建立了课程班级,学生在此下载课件、笔记等资料5万余套。以通识类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为例,仅进驻“易课堂”一周,其课程资料下载量就达到了1343次,远远高于本学期该门课程的选修人数,甚至还有许多下个学期选修该课程的学生也纷纷“囤货”,提前做好学习准备。

“易课堂”的倡导者、东华大学校长助理李永智告诉记者,“精准服务学生所需,突出学习核心地位,是‘易课堂’区别于其他学生网络社区的首要理念。”

“易课堂”不仅集聚了学校丰富的学习资源,还以友好的用户体验让学习变得轻松有趣。学生可以通过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多种终端设备访问“易课堂”,只要一键点击,就可以轻松获取所需的课程教材、课件、习题、授课音视频等学习资源。同时,学生还可按系统设计的分类上传各类学习资料,按照不同权限对资料进行处理,通过参与积分、勋章、排行等网上活动获得网络课堂的“学习奖励”,增添了学习的乐趣。

学校“搭台” 学生“唱戏”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网上显示“易课堂”教学资源的上传者并非是学校行政部门,而是一个个学生网民,这让记者深感奇怪。

李永智说:“目前,网上教学资源多以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或教师为主体建设,这种从上而下的网络资源建设模式存在‘与学生需求对接不够、更新不及时、后续维护难跟上’等隐患。”

因此,学校提出“易课堂”遵循“内容由用户创造”的网络规律,突出以学生为主体,采用“学校搭台、学生唱戏”的模式,即问题由学生提出,资源由学生筛选上传,学校校办牵头整合教务、学工、宣传、信息化等部门资源提供服务支持,在把握好方向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开放教学资源的知识更新和编辑权限,借鉴维基百科理念,打造校园“学习百科”。

记者了解到,根据网络空间中的表现,学生有着不同的网络“身份”,有的学生当选为“易课堂CEO”,则要把握学生网民需求,带领学生团队担负起日常建设的责任;有的学生成为“网络课代表”,则要负责与教师的衔接沟通、资料上传、开发体验、用户反馈等任务;有的学生由于课程笔记下载量高受到好评,成为网络“学霸”。

机械工程专业学生余石龙当选为“易课堂CEO”,他自豪地告诉记者:“同学们都在网上关注我所建设的课程,下载资料并发布各种对学习资源的需求,让我有一种明星般的感觉。”

服装学院学生郑涵是大家公认的“学霸”。她不仅主动搜集上传课程学习资料,还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读书笔记分享到网络平台,受到同学们的追捧,拥有众多“粉丝”,下载她的笔记已经成为很多同学的每日功课。学生们还组织“遇见学霸”线下活动,邀请郑涵从电脑屏幕走向讲台,现场分享经验。

任课教师适时进驻“易课堂”

记者还注意到，“易课堂”不仅吸引来了学生，还吸引来了专业课教师和辅导员，一批任课教师进驻“易课堂”，通过在线知识分享和互动交流等形式拓展课堂教育教学，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无形中还与学生建立了良好的“网络感情基础”。

纺织学院博导、教授邱夷平在易班网上拥有众多“粉丝”，他与同学们在网上交流学习科研心得，还分享个人成长经历，将思想教育蕴含在有趣的网上互动中，引发学生积极思考。

在机械学院教师唐智看来，“易课堂”已经成为他开展教学工作的重要阵地。作为一名80后青年教师，唐智喜欢通过网络和学生们交流。唐智希望自己“不仅是学生学业上的导师，还能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伙伴”。

“易课堂”还推出“易打印”功能，凡是在网上共享自己学习资源的学生，轻点鼠标，均可在线下校园内所设的“易打印”网点拿到免费打印的资料，而打印纸背面则设计了宣传教育内容。一名一年级新生告诉记者，他在入学录取通知书里就收到了学校邀请他进入“易课堂”的账号，这让新生在入学前能够提前了解专业课程及教师研究内容，方便做好学习准备。

学生处处长任晓杰介绍，2013级新生陆续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不到20天，注册加入易班网的人数超过七成，特别是互联网条件较好地区超过90%。新生通过易班网询问报到的注意事项，寻找未来的同学、辅导员和专业教师，讨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这里成为辅导员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

高校国际化的“而立之思”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1981年美国人白杰瑞（Gerard A. Postiglione）第一次来到中国，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北师大校园里悬挂的红色横幅。这时，改革开放大潮中的高等教育已经将目光瞄向了世界。

2003年，白杰瑞成为了耶鲁大学的访问教授。那一年，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也在这一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一个被称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分会”，以加深大学国际理解、推动高校国际交流合作为目标的民间工作学术团体也正式成立。

又过了10年，如今的白杰瑞已经担任了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政策管理与社会科学系主任。不久前，在他参加中国高教学会引智分会2013年会暨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时，这个成立仅10年的组织，其会员单位已经突破250个。

白杰瑞的经历，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历经30年的发展，如今中国高校与世界已经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国际化在此间究竟有何收获？又须作出怎样的思考呢？

国际化不是“添加”过程

不可否认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后3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无论从人员交流还是项目合作上，都与世界有了太多的交集。

1984年，白杰瑞曾在中国大学学习汉语。当时他所在的留学生宿舍与国内学生宿舍相隔很远。“这在当时是个普遍现象。”他说，而如今，高校里的留学生楼早已褪去了神秘面纱，中外学生的交流也再平常不过。无论是国外的人员还是项目，乃至思想都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大学校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周满生透露，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总数已经达到1780个。1978~2012年，全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64.47万人。至2012年底，以留学身份出国的人员有155.34万人，其中113.6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学习和研究。

于是，一个问题便出现了——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我们该如何权衡？

“国际化不是添加的过程，而是一体化的过程。”在讲演中，白杰瑞表示，对于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来说，国际化首先意味着引入智力，将国际化、全球的视角纳入高等教育当中，从而调整当地的高等教育目的和功能，提升教育质量，但这一过程并不是生硬地添加，而应是相互融合的。“每个大学都不一样，每个地方也不同。国际化要以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因地制宜地制定一体化流程。”

对于白杰瑞的看法，相信很多人都会赞同，但一味的“本土化”就一定合适吗？

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尔思是国内第一批中外合作办学的尝试者，然而就在不久前，他却在媒体上坦言，目前他们遇到的一个主要难题反而是被迫“本土化”。

刘尔思表示，很多学校都面对这一问题。例如，当课程体系、人才选拔机制等方面出现国内外标准不同时，我们必须服从教育部规范，甚至工资、住房、福利等也在其范围内。不适应这样的改革，中外合作办学就很难深入推进。

办学至今，刘尔思所在的机构共接受了国内外评估机构 10 余次评估，差不多每年一次。而海外评估标准又与国内标准不一致。“从监管角度来看，如果是海外权威机构已经评估过，教育部是否可以部分认可？”

“国际化与本土化需要相互适应。针对目前的国情，我们应该在民族文化上坚持自身特色，但在制度方面，我们多做一些‘添加’工作倒也无妨。”采访中，一位高校工作人员如是说。

发达国家，人才“强盗”？

“现在国际教育界认为，跨国教育和人才流动正经历一个人才外流—人才回归—人才循环的过程。最开始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科研环境改善，人才回归的力度加大；在第三阶段，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驱动，人才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循环。”这是周满生在发言中，对于国际人才流动趋势的预测。然而无论未来人才流动如何，至少在现阶段，中西人才的交往还难以改变“一江春水向西流”的现状。

仅以美国为例，2013 年国际教育交流开放门户报告显示：2012~2013 年，被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录取的中国学生人数从 19 万人增加到 23 万人以上，增幅近 21%。报告显示，自 2005 年以来，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学习中国学生一直以 16.5% 的平均速率增长。

而在另一方面，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今年 3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05 年希望留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博士生比例高达 89.4%，2011 年这一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依然高达 82%。

“曾经有一种疑问，称在人才交流方面，富裕国家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人才的‘强盗’？”白杰瑞表示，即使放在国际范围内，大型发展中国家走出的学生，也有八成左右不愿意回国。而发达国家也在采取简化签证程序，放开工作机会等手段，提升自身人才吸引力。

他坦言，国际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发达国家其实应该对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一定赔偿。然而在现阶段，这显然并不现实。对于可行的解决之道，他表示，发展中国家可以发展网络合作和远程教育，增加教育合作者的数量，同时增加联合办学项目。但他同时也承认，这两种做法的效果依然有限。

“最有效的方式，首先是提供一个非常稳定的学术职业，并提供具有足够吸引力的薪酬机制，同时提升学术界的自由度，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高层次人才的归国率。”白杰瑞说。

在年会上，也有其他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郝芳华表示，国内高

校需要为高层次人才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是激发高层次人才创新能力的保障条件。

大学的国际间“校企合作”

另一种合作关系也不容忽视,那便是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校企合作”。而在这方面,国内高校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周满生表示,总体而言,我国在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特别是跨国公司所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方面存在较大缺欠。

麦卡锡公司200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毕业生只有不到10%的人拥有为外企工作的技能,而相比之下,印度的该比例则高达25%。在中国160万名年轻工程师中,只有约16万人具有为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

事实上,跨国公司对于培养中国学生是有一定热情的。周满生曾和同事进行过相关调查。在回收的对跨国公司的问卷中,几乎所有的调查对象都在中国大学设有专项奖学金,超过60%的企业在大学设立了某种形式的专项研究资金。“跨国企业对中国进行教育投资的力度总体上大于本土公司。”周满生说。

而跨国公司本身的一些特点,也决定了其与大学形成密切伙伴关系的必然性。

周满生表示,跨国公司具有全球战略目标,同时,它们与本土公司的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就导致其人才招聘与使用策略发生变化,更多地将中国从生产基地逐渐变为研发基地和营销中心。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同中国高校合作,联合培训高级人才、联办实验室等,这都表明人才本土化战略有助于促进密切伙伴关系的形成。

周满生坦言,大学与跨国公司的结合,要落实到课程改革层面,展现相关领域的科技发展动态,展现跨国公司先进的核心技术,并用先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融会贯通地把握教学的精髓。“精品课程的编制与讲授一定是一流教师和一流企业专家的共同参与。政府应尊重大学的自治法人地位,不应该对此加以行政干预。”

当然,对此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马万华表示,国内高校在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上比较差,因此高校与跨国公司的合作需要谨慎,尤其是在科研方面。高校科研人员一旦被跨国企业所用,大学商业化不可避免也会产生诸如侵蚀大学公共性等问题。

人才“逆流”还需要多久

一次,吉林大学负责引智工作的人员与国外朋友交谈。当他向对方解释自己的工作性质后,这位外国朋友笑了:“你们还需要引智吗?世界上最好的智力资源就在中国,应该我们向你们引智才对啊。”

在年会现场,这位工作人员坦言,这件事情让他有些尴尬,而这份工作也多少让他无奈。究竟中外高校的最大差距何在?我们距离人才“逆流”还有多久?

在采访中,马万华坦言,中西方大学无论从办学理念、治理结构、学术文化和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拿西方的大学说中国的事并不妥当。“中国要走自己的路,根据自

己的需要办大学，这就是本土化问题，借鉴别人的东西可以，但模仿不行。”

2010年，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的一番话，也解释了这一疑问。

“莱文校长认为，中国在培养新型人才方面，与国外最大的差距在于课程和教学。”周满生说，美国创新人才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在于通识教育，以及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加强文史哲艺术等学科的教育。“中国的教育缺少通识教育，从我们自身的课程出发，我们确实需要改变长期以来学生过于封闭的教育，提升学生视野的广阔度。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也一直在努力。”

中国科技报 2013-12-13

教学评估：是“指挥棒”，还是“测量仪”？

编者按 我国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已有20余年的历史，期间先后经历了1994年的合格评估、1996年的优秀评估、1999年的随机性水平评估和5年一轮的教学工作水平评估，2011年正式启动了新建院校的合格评估，2013年开展老大学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试点工作。高校教学评估已经制度化和常态化，它对高校教育教学工作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作用之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我们注意到，一些教育行政官员、高校领导或者教育研究者在谈论教学评估时，常常用“教科书”“指挥棒”或者“测量仪”来形容。如果不去深究，这些比喻既形象生动，又恰如其分，但若深入考量，就会发现问题所在，而本文深入浅出的剖析，无疑为我们正确理解教学评估，提供了参考。

1 发达国家侧重于“测量仪”

教学评估的目的是事实说明还是价值判断？是促进发展还是引领发展？评估工作应保持客观中立还是强调先入为主？这实际上触及到了教育评估的根本问题。显然，把教学评估说成是“指挥棒”，就意味着突出教学评估的价值导向以及主观介入，而将教学评估看成“测量仪”，则无疑突出了教学评估的客观事实陈述特征。教学评估应该是指挥棒，还是测量仪？或者说是指挥棒好，还是测量仪更好？

关于这一问题，应该说，教育理论界似乎已有共识，一般把教育评估看作一种价值判断，评估的目的不在于说明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现状“是不是”，而在于要指出这种现状“好不好”。然而，“是不是”“好不好”由谁来决定？是由学校自己，是评估专家还是政府或社会？对此，不同的人、不同时代和国家，又有着不同的回答。

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大学有悠久的自由自治传统，教育评估须尊重学校的主体意志，外部评估只是客观说明学校自身状况，给学校提供一部显示器，它所显示的是学校内部标准，表达学校自己确定的目标及实现情况，政府、社会或专家并不直接给学校立标准订规

矩。只要考察一下欧美国家高等学校质量评估（或认证）指标体系，就会发现，其评估方案只是一个框架，由若干方面（如大学使命与目标、学校财政支持、课程与教学、科学研究、国际化、学生学习资源、毕业生状况、社会服务等）组成，每一方面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由学校来回答来举证。比如，“学校使命与目标如何？确立该使命与目标的依据何在？”“目标与机构的任务是否一致？”“课程设置与实施是否能够保证教学目标实现？”“是否有足够的学术人员保证计划和目标？”等等，这些指标和问题都是客观和中立的事实描述，并不起引导和示范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社会化的深入，政府和社会在大学办学中的作用有所强化，越来越多的欧美国家政府通过评估体现政府意向，影响高校办学方向，其手段就是将绩效评估结果与财政拨款挂钩，通过评估加强对高校的规范和控制，但这种控制和规范并不强势。一方面，以评估结果来确定高校拨款的范围和力度十分有限，它仅仅涉及高校科研经费拨款，这部分拨款不到全部高等教育事业费的 10%，而 90%左右的经费还是按照学生数量及生均额度来拨付的，与评估无关，这体现了拨款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尽管评估结果影响高校科研费用，但评估本身并不强化或者改变高校的办学目标，它只是表明高校办学或研究的实际水平。当然，除此而外，政府通过评估也向社会和公众传达高校教育教学质量信息，促进社会和公众对高校工作监督和信息公开使用。这就意味着，绩效评估结果高低好坏，其衡量的标准是高校自身。

可以说，欧美高校评估不是指挥棒，确切地说它只是一部“显示器”，用以显示学校自立的标准或者学校向社会所作出的承诺是否达成。高校评估具有价值中立性。我们也经常看到或听到，高校对政府或者专门机构所进行的评估保持相当的谨慎和顾虑，唯恐评估导致政府理念和意志的介入，或者评估延长政府的手脚从而对高校形成限制。而政府也尽可能限制评估的边界，不去碰大学自由自治这根敏感的神经。

2 发展中国家侧重于“指挥棒”

但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力量比较强大，不仅掌握着教育资源及其配置，而且还规定学校办学宗旨和方向。这一点在我国最为突出。长期以来，受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政府与高校之间形成了实际上的上下级关系，高校只是政府的所属部门，其办学只是执行政府既定的方针政策，学校管理制度、培养目标、招生、专业设置、教学计划等都由政府规定，高校基本没有办学自主权。这种状况直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尤其是 1992 年国家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才有所改变。近些年来，政府职能及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已有所转变，高校办学自主权有所扩充，但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和控制并未减弱，所改变的只是管理形式，即由过去直接行政命令到现在依靠法律、信息、经济等手段，其中评估被看作最有效的方法。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就提出了“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在评估方案设计上，强调“规范性、引导性、激励性、针对性

和发展性”原则。所谓规范，就是政府直接制定评估指标体系，直接规定学校教育条件、教学管理、教育质量等软硬件等基本办学标准与要求；所谓导向，就是评估指标体系明确学校办学方向和教学改革发展目标，同时明确该阶段高校重点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以最新的评估方案为例，2011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的意见》指出，开展评估的目的在于“……促进政府对高等学校实施宏观管理和分类指导，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办出水平、办出特色”。针对新建院校办本科时间短、基础薄弱且绝大多数地处非中心城市这些实际，合格评估方案明确提出了“四个促进、三个基本、两个突出和一个引导”的评估要求，其中“四个促进”，即通过合格评估促进教学经费投入、促进教学条件改善、促进教学管理规范、促进教学质量提高；“三个基本”，即办学条件基本达标、教学管理基本规范、教学质量基本保证；“两个突出”即突出为地方（行业）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突出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一个引导”，即引导高校建立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从中可以看出，合格评估对新建院校办学和教学工作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导向性。

同样，审核评估方案（试点）提出了“一个坚持、两个突出、三个强化”的指导思想，其中“一个坚持”，即坚持以评促建工作方针；“两个突出”，即突出高校内涵建设、突出高校特色发展；“三个强化”，即强化办学合理定位、强化教学中心地位、强化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显然，审核评估方案也有较为明确的导向性。在这一点上，与欧美国家高校评估形成了鲜明对照。欧美国家评估方案没有如此明确的导向性，其指标体系是客观中性的描述。我国高校本科教学评估指标体系，则基本强调方向性、引导性和规范性要求，比如，学校是否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否体现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办学是否符合国家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教学过程是否体现以人为本思想，办学条件是否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等等。

由此可见，我国高校教学评估集中反映了国家意志和政府意愿，这也是政府积极推进高校教学评估工作的目的所在。通常人们说“评估是指挥棒”，它指向哪里，高校办学就跟到哪里；“评估是教科书，它怎么说，高校就怎么做”。鲜明的导向性和规范性是中国高校教学评估的特色。

3 “指挥棒”“测量仪”各有所长

如此说来，是否可以说欧美国家高校评估的“测量仪”好，而中国高校评估“指挥棒”就不好？或者相反，中国高校评估好而欧美高校评估不好？笔者认为，两者间不能简单进行对比。“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评估也是如此。任何一种评估制度都离不开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

西方国家因深受自由主义及其市场经济影响，高校评估尽量坚持中立原则，不影响和左右大学自由，优点是鼓励高校竞争，容易创新和办出特色，但缺点是过度的自由自治导致高校间缺乏相对统一的规范，质量参差不齐。“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在美国，最差的大学也在美国”。这也是近些年发达国家开始加强对高等教育评估和控制的原因。

我国高校教学评估导向性强，优点是目标明确、规范统一、引力强推力大，缺点是办学

趋同、千校一面无特色，高校竞争意识弱，整体质量不高。所以，今后评估改革，需要体现高校主体地位，增进高校自主办学能力，适当弱化评估指标体系的刚性要求。但改革需要一个渐进过程，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当前，高校实际办学中还存在盲目倾向，同质化现象严重，规模求大、层次攀高、专业求全，需要政府加以引导，尤其是通过评估这一有效手段，促进高校分类发展，合理定位、各安其位、各展其长，办出水平、办出特色。这种情况下，评估作为“指挥棒”功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否则，几千所高校都争着办学术性和研究型大学、几千万在校大学生都被按照学者和科学家模式来培养，其后果不堪设想。

可以预见，随着高等学校办学自主度和成熟度的提升，政府的外部控制力量以及评估的导向作用肯定会逐渐减轻，评估由过去在前台的直接提拉、引导和规范，变为在后台的间接促进、监测和服务。归根到底，教学评估将由过去的指挥棒、教科书变为测量仪。事实上，新的评估方案已朝此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审核评估提出了“用自己的尺子量自己”的理念，重点是评价学校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是否实现了自己设定的目标。审核评估取消了过去一直沿用的指标体系称谓，改为“审核评估范围”，意图是增强评估方案的弹性和客观中立性，扩大学校的主体性。这一方向值得肯定。

中国教育报 2013-10-23

协同创新在芬兰

当下，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正在我国各地稳步推进。这一工作将有效会聚各方资源，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式发展。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协同创新已经在欧洲国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个只有 550 万居民的北欧小国，芬兰在 100 多年前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偏远国度，除了森林与湖泊，拥有的自然资源很少。然而，近百年来，芬兰克服了资源匮乏的困难，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的福利国家，其现代通信技术产业更是改变了全球的产业格局。

是什么因素促使全球规模最大的现代通信技术集群出现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资源短缺的国度？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来到芬兰，在对高校教授、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在读博士生等人进行采访时发现，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界的协同创新、共同致力于将知识技能转化为关键的社会资产是他们的共同答案。这些答案，对中国有着很好的启示。

没有围墙的大学校园

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陆一晨是阿尔托大学建筑艺术学院的一名在读博士生，今年已经是她读博士的第二个年头了，可她待在学校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两个月。

原来，她参与了阿尔托大学与一家公司的合作项目，在与学校导师保持联系的基础上，平时在公司里完成相应的项目内容。

“把所有的企业与大学捆绑起来，将研究者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公司业务发展密切结合，这是芬兰所有大学的特点。”陆一晨告诉记者，这样的组合在芬兰已经司空见惯，几乎所有的专业与学院都是按照该模式与产业界对接，“这样能更好地将学术知识转化为产品与解决方案”。

记者注意到，“服务、领导力、国际化、建设性”是阿尔托大学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把“服务”作为大学未来发展的第一战略目标，这对来自中国的终身教授孙志培来说“很新鲜”。

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博士毕业的孙志培，在异国游学后于半年前开始担任阿尔托大学生物研究中心的终身教授。

“选择在这里工作，主要是基于大学与公司产业紧密的结合，这样我们的研究不仅有充足的经费保障，还能看到成果很快转化为产品。”孙志培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三螺旋”的制度保障

据芬兰科学院的统计数据显示，芬兰 2012 年共投入 71 亿欧元研发经费，其中的 20 亿政府经费都是以大学、科研机构与公司合作项目的模式运行的。

在坦佩雷大学管理学院，中国教育研究交流中心的研究负责人蔡瑜琢博士为记者画了两幅简图：第一幅是一个大圆圈包含着两个相互交叉的小圆，第二幅是三个相互交叉的小圆。

蔡瑜琢告诉记者，第一幅反映了中国的政府、大学、产业的关系，“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科研资助体系，政府不仅提供经费，还管理着整个产学研的合作过程”。在蔡瑜琢看来，政府过多干预科研活动与产业转化，“不利于科学高效而快速地转化为生产力”。

据蔡瑜琢介绍，第二幅表达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亨利·埃茨科威兹博士提出的“三螺旋”国家创新模式。

按照“三螺旋”模式，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将根据市场要求联结起来，激发创造出大学科技园区、孵化器、研发中心、高科技衍生公司等各种“混成组织”，推动区域协同创新深入开展、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繁荣。

“芬兰的科研资助便是这种模式，政府只是提供科研资金，谁来申请都可以，但必须是大学与公司携手来申请，这样便能保障科研成果顺利、快速地转化为产品、产业。”蔡瑜琢表示，“政府只是起到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并不直接参与项目管理与运行。”

新兴产业更重协同创新

陈正宇已经在诺基亚的研发中心工作 10 多年了，上世纪 90 年代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来到坦佩雷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就是奔着诺基亚来的。”陈正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毕业后的陈正宇留在了位于坦佩雷理工大学内的诺基亚中心工作，“芬兰大部分有规模

的公司都在大学设立了研发中心，诺基亚总部就是考虑到坦佩雷理工大学的研发力量与基础研究，而在大学附近安家。”陈正宇表示，“新兴的高科技公司更是如此。”

成功开发“愤怒的小鸟”游戏的 Rovio 公司便成立于校园之内。2003 年，3 名来自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的学生参加了由诺基亚、惠普赞助的手机游戏开发比赛，并凭借一款实时多人游戏“卷心菜世界之王”一鸣惊人，3 人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获得政府经费资助，最终将其发展成一家颠覆行业的娱乐媒体公司。

“手机与电脑上的一些创新对小公司来说是有风险的，大学里的研究就能帮上忙。”阿尔托大学的皮尔图·海莱宁认为。

皮尔图·海莱宁去年被阿尔托大学任命为芬兰的第一位电脑游戏教授，他设计的一款名为“实况功夫”的电脑游戏曾是游戏网站上下载量最多的游戏之一，而这款游戏便是他与一家游戏公司合作开发的。

“我们可以用疯狂的点子来做实验，从公司那里获取用户反馈信息，并向公司提供可靠的研究数据。”皮尔图·海莱宁表示，“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科研经费，公司也有了产品和解决方案。”

中国科技报 2013-7-03

检验本科学业，毕业论文还能否作为最重指标

大四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找工作、考研、申请出国留学、旅行……最后才是毕业论文。本应承载着对大学本科教育检验作用的毕业论文，如今却离初衷越来越远，不仅没有受到大学生的重视，学术不严谨的情况屡见不鲜，甚至还出现了抄袭、代笔等现象。

又到一年毕业季，学生对于毕业论文的态度怎样？本科生毕业论文是否应该有所改变？这在校园里早已成为师生们热议的话题。

比起本科毕业论文 学生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事”

提起毕业论文，上海大学新闻专业应届毕业生刘明辉显得不以为然。因为毕业后打算直接工作，对于刘明辉来说，工作才是头等大事，毕业论文要为其让路。3 月份开始准备撰写毕业论文，5 月份定稿。看似有 2 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一篇论文，但实际情况是，刘明辉一直在准备就业的报社实习。白天出去采访写新闻稿，晚上回到学校才有一些精力放在论文上。尤其是 4 月份，找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报社提出两周的“能力考查”，刘明辉干脆将论文搁置，两个星期全部用于工作考核。实习单位最终给刘明辉发放了工作 offer，但是毕业论文却因此质量不佳，第一次答辩时没有通过。

对于自己论文的缺陷，刘明辉其实很清楚。针对论文选题，刘明辉就和指导老师存在一定的分歧。摇滚音乐一直是他比较关注的领域，他的毕业论文也是针对媒体对于摇滚音乐报道进行研究。虽然一手资料比较丰富，但是四年来刘明辉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扎实的理论基

础和系统的研究思路，加上时间比较紧张，就匆匆应付了一篇文章。“老师说我论文的基本格式都不对，语言也不规范，甚至让我回去好好学习一下怎么用论文语言写作。”

本科生学术能力有限，对毕业论文不以为现的现象并不在少数。大部分重点高校的学生，即使是对毕业论文有正确的认识，但总是有这样那样“更重要的事”等他们去关心。

复旦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李佳媛虽然早就落实了工作，仍然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办理毕业手续，与即将分别的同学和老师叙旧，趁着最后自由的时光到各地去旅行，还有时间发展自己的特长爱好——创办音乐电台等等。“我也很重视自己的论文，指导老师的要求也很严格，但最终呈现出的论文肯定没有达到自己最好的水平。”她告诉记者，虽然毕业论文是必修课，但是算在大四下学期，成绩不会对找工作和考研有任何影响。学院老师也不会毕业论文答辩过程中对学生设置“关卡”，即使是写得再差的学生，也只不过回去修改，顶多给两次答辩的机会。只要没有盲审，学院也就走个过场。

本科生学术能力有限，对待毕业论文的态度也不够重视，怎能写出具有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好论文？更多的论文不过是“集百家所言”，“只要格式上还像是篇论文就不错了。”

立志学术研究者 论文成了“最重要的事”

当然，大学生中也不乏专心学术者。张莉莉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早在大四一开学，张莉莉就得到了保送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资格。不用准备考研或者出国资料，没有找工作的担忧，张莉莉算是少有的有更多精力专注于论文的学生。“3月底动笔之前，我就在思考毕业论文的定位。既然自己还要继续深造，我就想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既是对大学四年的交代和总结，也是研究生学术能力的一个证明。”

张莉莉的论文选题是通过唐代的文学资料来解读唐人墓葬中的壁画，以此了解唐人对于墓葬世界的想象和仙幻观念。为了完成这篇毕业论文，张莉莉特地跑到西安唐安公主墓和陕西省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阅读了大量的文献书籍，还定期与指导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最终完成的论文得到了答辩老师的一致好评。

三个多月的论文写作，就像经历了一场学术的洗礼，张莉莉感觉收获颇丰。“我明白了做论文其实与做任何事都是相同的，即使竭尽全力，还是有很多欠缺的地方。做论文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的知识架构还有很多不足，实践能力、与人沟通的经验还要积累。虽然自己的成绩一直不差，但我还是第一次如此踏实认真地写一篇文章，心里特别安静。”

相比于就业的同学，继续读研的学生对于毕业论文有着更要的要求。对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学生而言，毕业论文是对自己学术能力的最好证明，学习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也是对自己学术能力的又一次历练。

文科专业之外，一些理工科专业会以毕业设计取代毕业论文，作为本科学术知识和能力的综合体现。吴强是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应届毕业生，对于建筑系的学生来说，毕业设计就是跟随指导老师针对一些实际建筑项目进行设计，包括CAD制图、制作建筑模型等。在吴强眼中，毕业设计不但必要，而且很重要。一方面理工科的成果很容易被“量化”，通过实验

数据就能看出学生对于学术的严谨度和学术能力，因此对待实验和设计都要踏踏实实从头做起；另外，建筑系学生的设计作品会集结成册，内行人看到设计的作品会直观了解到这个学生几年来的学术内涵和设计理念，不管是今后从事科研道路还是走上社会从事相关工作，这都是能力的体现。

评价本科四年学业 呼唤多元方式

记者在淘宝上搜索“毕业论文代笔”，得到超过 500 条搜索结果。其中两家生意比较火爆的代笔商家，一个月内的成交量分别是 4943 笔和 7779 笔。商家客服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代写过很多本科毕业论文了。对于开题报告和论文正文的要求和格式、学校检测软件、检测率等要求烂熟于心。千字 50-150 元的价格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还算合理，“亲真是太好了，麻烦您改了那么多次，态度一流，速度也很快。”诸如此类评价不在少数。

学生所学知识难以达到论文“在某一领域有独到见解”的要求，以及很多本科毕业生只能通过复制他人论文成果等剽窃手段来完成毕业论文的事实，引发了教育界关于本科毕业论文存废的激辩。

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设计）通过答辩，方可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在教授们看来，判别一个大学生是否名副其实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是否具有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较大可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较大能力”，而判别的最佳方式是要求大学生撰写符合指标规定的论文。

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要求本科生和硕士都撰写论文，貌似可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果却适得其反。一方面，由于不少学生根本没有学术研究的兴趣，也没有培养起学术研究的能力，因此，对于论文，基本上采取应付的态度；另一方面，不少本科生、研究生，面临就业、升学的压力，不得不花很多时间跑人才市场，准备考研、出国，学校也为提高就业率、考研率，对这些学生“开绿灯”。可以说，毕业论文的要求非但没有拯救大学教育质量，反而破坏了大学的风气，催生了学术不端，让很多学生背上了不诚信的枷锁。

同济大学广播电视新闻系主任柳珊教授认为，现在的大学已经逐渐脱离“精英教育”本质，变得越来越平民化，大学生的学术能力也不能与以前同日而语。原本本科教育希望通过本科毕业论文展现学生综合能力，并通过毕业论文的撰写让学生能力再提高一个台阶的初衷，也与现实相去甚远。

柳珊建议，针对部分专业，可以将单一的、强制性的本科毕业论文制度加以改进。对于新闻等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强制每个人都撰写本科毕业论文就没有必要，可以将其改成选修形式，对学术有兴趣、有意愿的学生可以撰写毕业论文，其他学生可以通过参与实践项目、学术项目等多元的方式对自己的本科学习进行总结。但对于哲学、中文等本身需要通过文字体现逻辑思想的学科，毕业论文的保存仍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理工科等需要实践操作完成毕业设计的学科，毕业设计环节不能废除。

同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常青教授认为，对于建筑专业而言，毕业设计非常重要，是对学

生综合能力的全面、有效考察，指导教师可以对毕业设计的质量进行把控，甚至是对考察方式进行改进，但毕业设计的保留则毫无争议。

文汇报 2013-7-1

杜玉波：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的基本思路和重点任务

“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出的最直接、最明确的要求，关系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和质量提高，关系高等教育强国梦和中国梦实现。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也随之进入一个十分重要和紧迫的阶段。近年来，特别是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三年多来，教育部门和各高校在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启动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计划，开展了试点学院综合改革等，取得了积极进展、积累了有益经验。但也必须看到，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不够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高校根据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科学调整人才培养目标的主动性不强，优化人才培养过程的好办法不多，集聚社会资源共同参与人才培养的活力不够，特别是与有关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协同培养人才的新机制还不完善等。

为此，必须下决心向机制开刀，向创新人才培养机制要质量，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基本思路应当包括：

第一，创新人才培养理念是基本前提。只有以现代的、科学的教育理念才能培养出适应“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化”同步发展新要求的人才。要引导高校摒弃唯考试评价、唯分数论的观念，真正树立起纲要提出的人人成才、多样化人才、终身学习、系统培养的理念；摒弃拼规模、比数量的观念，真正树立起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适应社会需要为检验标准、以学生为本、以学生评价为先的理念。所有的政策设计都应把握这样的导向。

第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是主要手段。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从选拔录取到培养过程再到社会评价都需要改革，但对高校来说主要是培养过程的改革，而其中教育教学改革是核心。具体说，要在“四个推动”上下功夫。一是推动形成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目标动态调整机制，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类型层次结构；二是推动建立教学内容的更新机制，推进课程改革，提高教材质量，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三是推动教学方法和模式改革，创新教学管理制度，能够向不同的学生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四是推动教学团队发展机制创新，加强专兼职教师队伍建设，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第三，创新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机制是迫切要求。高校的人才培养类型是多样的，但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不断推进，地方经济和行业发展对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加，下大气力创新多层次的“三型”人才培养机制的任务极为迫切。这就要求高校突破传统学术型基础型的培养模式，改变“三重三轻”的现状，做到“四个更加

注重”：即，改变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专业轻人文的现状；在专业设置上更加注重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在课程设置上更加注重科学知识、思想品德、人文素养和实践能力的融合，在教学方法上更加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社会合作上更加注重用人单位的参与，培养具有较强岗位适应能力的面向地方、面向行业企业的高素质人才。

第四，提升实践能力是重要突破口。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目的是推进素质教育，着力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其中，实践能力培养是目前非常薄弱的环节。我在学习《邓小平年谱》时看到，小平同志 1985 年评价云南边防前线作战部队时曾说过：

“听过枪响和没有听过枪响的部队大不一样。没有打过仗的经过训练可以打仗，打过仗的经过训练更能打仗。”要下大力气落实好七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推动高校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加强学生实习实践基地建设；加强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社会实践活动；探索建立完善学生实习实践的相关制度。

归纳起来，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的基本思路就是：在科学的人才培养理念指引下，通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激发高校人才培养的潜力和活力，特别是通过创新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机制，着力突破实践能力这个薄弱环节。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要做的工作很多，我认为，目前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特别是主动适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新要求，针对人才培养的薄弱环节选准突破口，在与之密切相关的法学、新闻传播学、农林、医学等学科专业领域，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发挥示范引领辐射作用，形成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良好局面。

在法学教育方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迫切需要大批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高素质法律人才。目前有 631 所普通本科高校设有法学类专业，在校本科生近 31.25 万人。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不够深入，能在国际舞台上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领土、发展和安全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能力不足。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做好新闻宣传工作，迫切需要大批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目前新闻传播相关专业有专业布点 1080 个，在校本科生达到 23 万人。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不够深入，对外宣传人才短缺，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好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不足。在农林教育方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的农林人才。目前，高校开设的农林类专业有 27 种，专业布点 824 个，在校本科生达 24.4 万人。但基层人才培养能力不足，能够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应用型复合型农林人才相对短缺。在医学教育方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的医学人才。目前有 167 所普通本科高校开设临床医学专业，在校本科生 37 万人。但医学生临床实践教学环节严重缺乏，面向乡村、服务基层的人才培养能力不足。

因此，我们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根据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的要求，以实施“卓越计划”为抓手，着力创新高等法学、新闻传播学、农林、医学领域人才培养机制。这些改革的思路可以归纳为“必须三个坚持”：

一是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基本导向。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统领高等法学教育，增强学生服务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高等新闻传播教育，引导学生始终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政治立场政治方向，秉持新闻职业操守，履行新闻工作社会责任。要培养勇于到条件艰苦的基层、国家建设的一线、服务群众的前沿开辟事业发展新天地的农林、医学人才。

二是必须坚持协同育人培养模式。要紧紧扭住资源共享、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的基本要求，推动高校与有关部门、行业企业共同制定培养目标、设计课程体系、开发优质教材、组织教学团队、共建实践平台，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研与教学的互动、培养与需求的对接。

三是必须坚持制度建设重要保障。要抓住培养标准制定、教师与从业人员互聘、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等重要环节，建立系统完善的制度。高校与有关部门、行业企业共同建立并完善人才培养目标协同机制、教师队伍协同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和管理协同机制，实现协同育人、合作共赢。

2014年，要在这四个学科专业领域实实在在地干成几件事，把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工作不断引向深入。一是以推进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为重点，把高等法学领域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引向深入。会同中央政法委等部门选聘法律实务部门专家到高校兼职或挂职任教，选聘高校法学专业骨干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兼职。建设若干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涉外法律人才、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二是以推进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共建新闻学院为重点，把高等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引向深入。推动部校共建新闻学院管理机构、精品课程、骨干团队、实践基地、研究智库。建设应用型、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和国际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基地。继续选聘优秀编辑记者到高校兼职或挂职任教，从相关高校新闻传播院系选派骨干教师到新闻单位兼职或挂职。三是以召开全国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工作会议为契机，把高等农林教育领域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引向深入。会同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启动实施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遴选一批高校开展拔尖创新型、复合应用型、实用技能型农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开展国家农林教学与科研人才培养改革试点，设立“双师型”教师岗位，深化面向农林基层的教育教学改革。四是以推进“5+3”一体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为重点，把高等医学教育领域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引向深入。会同卫计委推进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工作，重点推进“5+3”（“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加“3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或“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标准化、规范化合格医生培养制度。

深化面向基层的医学教育改革，培养能在乡镇卫生院从事全科医疗的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素质医疗卫生人才。

在做好以上四个学科专业领域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的同时，还要围绕人才培养机制改革这个核心，继续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深耕细作已经启动实施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有关计划。总结“拔尖计划”实施四年来的做法和经验，探索完善“一制三化”的拔尖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与中科院优势互补，继续实施“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探索完善校所协同、教学与科研互动的人才培养机制。以推进与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认证为契机，继续实施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依托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开展与国际标准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认证。

二是基本建立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要按照基本建立适应大众化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的目标要求，颁布实施“国标”，制定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颁布实施“行标”，推动有关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颁布部分专业人才培养标准。颁布实施“校标”，推动高校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三是优化本科专业结构。重点完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公共服务与管理网络平台，促进形成专业设置宏观监管和动态调整机制。突出社会需求和学生就业导向，推动高校办好一批优势特色专业，加强社会紧缺的集成电路、服务外包等专业人才培养。

四是继续实施好“本科教学工程”。改革项目管理方式，允许高校跨项目统筹使用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经费，鼓励高校把钱用在支持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上，系统推进本科教学改革。

五是深入推进试点学院等改革试点项目。引导高校把试点学院的“三改革一完善”也就是“改革人才招录与选拔方式、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师遴选、考核和评价制度、完善学院内部治理结构”的重点任务更加聚焦到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上。进一步完善试点转示范机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完善试点院校之间的交流研讨平台，发挥以点带面的辐射作用。

总之，要按照上述改革思路和工作安排，努力实现法学、新闻传播学、农林、医学等学科专业领域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新突破，同时做好五项相关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工作，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